

离散华人、时空社会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评陈珮珊《离散华人的祖国》

陈非儿

近年来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影响力的提升 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人员跨域流动现象的增加 在区域和全球背景下研究华人移民的历史 吸引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区别于研究中国对华人移民的影响及华人移民对全球的影响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副教授陈珮珊(Shelly Chan)^①新作《离散华人的祖国:全球移民时代的近代中国》研究的核心是华人移民如何改变近代中国。^②作者将这一问题放在全球史(global Chinese history)的框架下思考 其深层次的关注是近代中国的全球参与问题。

陈珮珊先后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学术兴趣及研究方法 受到两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前者以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为代表 较早关注中国境内的移民;后者以贺萧(Gail Hershatter)为代表 提倡在研究中运用性别视角与方法。^③本书是作者在2009年提交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④与博士论文相比 作者将中国近代史与离散研究(diaspora study)相结合 从时间维度提炼出的“离散时间”与“离散时刻”理论 是本书最大的亮点。在下文中 笔者首先介绍本书的核心概念并概括主要内容;接着 尝试梳理本书的理论来源——离散研究与时空社会学 阐述离散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于华人(研究)产生的争论 以及社会学理论对海外华人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启发;最后 从学术史的角度指出本书在案例选择方面的不足与推进空间。^⑤

一、概念与理论:离散华人与时间维度

本书讨论的基础和起点在于近代华侨的诞生。王赓武认为近代意义上的华侨(Overseas

① 2020年8月陈珮珊转任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历史系副教授。

② Shelly Chan, *Diaspora's Homeland: Modern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 Migra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③ Diana Lary, *Chinese Migrations: The Movement of People, Goods, and Ideas over Four Millennia*, Rowman & Littlefield, 2012; 贺萧《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张赞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④ Shelly Chan, *The Overseas Chinese (Huaqiao) Project: Nation, Culture, and Race in Modern China, 1890-1966*,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2009.

⑤ 据笔者检索 英文学界已有10多位学者在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China Review*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书评。学者们肯定陈珮珊在长时段历史中 讨论华人与中国关系、移民对祖国影响的努力 给予其概念化思考以很高的评价。但是 这些评论未能从跨学科视角 深入剖析作者从时间维度研究移民历史的方法论来源 及其对华人研究和广义的中外关系史、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启发。本文希望结合中国(文)学界的研究 重点阐释这一点。此外 2018年8月《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众号刊发首篇中文书评,“刘青:海外华人移民与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但只着重于介绍本书内容。https://mp.weixin.qq.com/s/5XgNReKxd_sdxM-5RSCO_A [2018-08-31]

Chinese) 与传统侨居(sojourn) 有重大区别。从历史上看,至少在 10 世纪已有中国人侨居海外(主要是东南亚),但中国政府一直不承认这一侨居传统和群体,否认其身份并拒绝给予保护。19 世纪末的大变局,使得清政府逐渐注意到这一群体。“华侨”一词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政府对侨居现象的认可,承认侨居者的历史、现实及贡献。与中国历史上真正描述移民的词语(如流民与难民) 不同,“侨”借鉴了 4—6 世纪北方世家大族短暂向南迁移的历史,因此是地位的象征,是优雅的名词。^① “华侨”一词并没有创造侨居现象,而是通过赋予侨居以雅致、体面的名称,使其有了确定的方向和新的意图——向侨民灌输民族意识,呼吁侨民爱国主义,成为 20 世纪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② 因此,“华侨”一词从诞生伊始就是一个政治概念,主观上反映了侨民与中国联系的程度;^③ 客观的西方殖民背景,刺激了中国政府对侨民的认可与重视。^④

陈珮珊延续华侨概念的讨论,更加强调华侨与祖国二者间的“关系”。19 世纪的“华侨”新概念融汇了古今——“华”是相对于西方来说的华人性,“侨”是历史形成的侨置、侨寓等时间性含义。华侨与祖国事实上是互相定义并互相构成的(mutual constitution) 移民与祖国的互动关系是定义华侨的充分条件。二者关系的生成与存续,不仅包括祖国将离散群体纳为华侨的尝试,也包括移民将中国视为祖国的努力。^⑤ 既往研究主要关注前者,即中国如何引导这一群体为民族国家服务;陈珮珊则以移民为主体,讨论近代中国围绕“移民—祖国”互动关系而产生的一系列复杂问题: 奴隶制与自由劳工,海外移民与殖民,儒家思想与基督教,跨国家性别分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

作者使用“离散华人”代替传统“华侨”概念,是希望强调移民身份的不稳定性及与祖国关系的动态性——华侨并非同质的、一成不变的,与祖国的互动关系定义了华侨的内涵。中国未曾对华侨一呼百应,只是在某个特定时间点,中国被认定为“祖国”,各种各样的行为体被纳入“离散华人”。因此,“离散并非一个固定社群,而是政治团结的策略,文化混杂的棱镜,以及身份是一种过程的提醒”。^⑥ 陈珮珊正是通过聚焦离散华人回归祖国的过程,来追溯移民与祖国合作共生的轨迹。

在互动视角与离散理论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从时间维度(temporality) 重新思考华侨史与中国近代史。这一思考主要源于移民研究对时间性的关注,以及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作者认为,以时间之尺衡量,华侨不仅是一系列的跨国社群,也是一连串的跨国时刻。移民回归祖国的一个个时间点,象征着中国与世界的分离或联结,显现中国参与世界进程的轨迹。^⑦ 作者将这一轨迹与时间点提炼为“离散时间”(diaspora time) 与“离散时刻”(diaspora moment) 的概念。

离散时间是指迁移影响个人、家庭及社群生活世界多元而持续的方式。它有些类似于布罗代尔的“社会时间”,可以被理解为中国的移民传统,跨国家家庭生存与积累的方式。这一移民传统不可避免地受全球作用力的影响,并持续地与其他日常生活实践相结合,缓慢且无声地变迁。离散时刻则突发或复现于离散时间与其他突发事件的交汇,并产生广泛而意外影响的时间点。在这些时间点

① Wang Gungwu, *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47.

② Wang Gungwu, *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 p. 54.

③ 王庚武《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发展》,《华人与中国: 王庚武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14—329 页。

④ 王庚武《华人、华侨与东南亚史》,崔贵强、古鸿廷编《东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教育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1 页。

⑤ Shelly Chan, *Diaspora's Homeland: Modern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 Migration*, p. 11.

⑥ Shelly Chan, *Diaspora's Homeland: Modern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 Migration*, p. 8.

⑦ Shelly Chan, *Diaspora's Homeland: Modern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 Migration*, p. 12.

上,移民与祖国发生各种各样的关联,引发许多关键性的讨论,周期性地引入外力并改变祖国。^① 离散时间与离散时刻的关系,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历史时间的不均质,它有浓有淡,有张有弛。离散时刻就是集中各种各样要素的最紧张的时间点,特殊的事件就在这些动点集结的意义上具有媒介功能。^② 作为一种媒介,离散时刻为我们提供了从华人视角思考中国近代史的契机。

二、离散时刻:移民对近代中国的塑造

在本书中,作者聚焦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中国历史上的五个离散时刻,发掘或补充民族国家史学框架下,未被留意的离散叙述,以此探讨移民对近代中国的塑造。从作者所选取的五个时刻来看,其着力点并不在于新议题的发现或新史料的发掘,而在于将老议题赋予新解读,特别注意跨学科方法的应用,如跨国转向与国际史、文化研究与文本分析、性别视角与阶级话语,紧密追踪并贴合了史学前沿。

第一章“大合流”聚焦19世纪40—70年代华工出洋的历史。“大合流”精准地揭示了苦力贸易的全球本质:在空间上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广大海域,牵涉宗主国与殖民地外交官、中介人、种植园主等多个主体;在时间上恰逢奴隶贸易废除后世界市场对自由劳工的渴求,以及中国卷入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此外,新的通信技术与交往方式也催生了新式人群——抗议者、活动家及媒体人等。多重时间与空间的合流,促成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离散时刻——“契约华工危机”的出现。作者认为,危机出现与晚清政府新式外交努力,共同创造了“自由移民”与“中国主权”的概念与实践。这一离散时刻促进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和近代外交与主权观念的生成,也是帝制中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初始。

在第二、三章中,作者将离散经验与离散叙述结合,回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暨南学人对东南亚华人的历史书写,追溯林文庆儒学复兴主义思想的形成。通过文本分析,作者发现暨南学人借用欧洲及日本殖民话语,用殖民意识和经历来“包装”中国移民,将华侨塑造为掌握近代中国复兴关键的历史主体,书写“中国定居型殖民主义”。林文庆在英殖民地、英国本土及清末民初中国的离散经验,促进其对欧洲种族思想、性别观念、传教士话语及启蒙思想与科学观念的吸收。正是这些离散时刻与经验,促使其对儒家思想的彻底改造,与鲁迅的思想纷争也由此而生。

第四章“留守妇女”,作者从性别视角分析土地改革与婚姻法在侨乡的实践,探讨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与移民关系的互动。她突破了以往学者将侨汇作为华侨与祖国冲突及化解的经济解释,^③具体分析社会主义与华侨跨国家庭两种时间秩序的碰撞。^④从跨国维度来看,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远非一个封闭的系统,它持续受到华人移民传统所带来的全球作用力影响。两种秩序相遇,使得政府最终承认移民纽带取决于性别分工,侨汇是侨乡经济的生命线,而婚姻关系又是这条生命线的基础和保障。

第五章探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归侨融入社会主义祖国的艰难历程。以华侨农场的普通归侨及

^① Shelly Chan, *Diaspora's Homeland: Modern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 Migration*, pp. 12 - 13.

^② 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47页。

^③ Stephen Fitzgerald,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A Study of Peking's Changing Policy (1949 - 197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52 - 73; Glen Peterson,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outledge, 2012, pp. 27 - 74.

^④ Shelly Chan, *Diaspora's Homeland: Modern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 Migration*, pp. 109 - 110.

华侨新村的资本家为例,勾勒党和国家在过渡阶段,以“优待”开辟独立时空帮助归侨融入国内;到“大跃进”时期重新将归侨纳入单一社会主义体系的转变过程。在归侨安置初期,阶级、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被隐去,将政治身份予以模糊化处理,带来了侨务政策的灵活性。随着“大跃进”的展开,归侨的“海外关系”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相联系,被当成归侨一切问题的源头而予以批判。^①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海外的“恐惧”——归侨被视为“回归的资本主义幽灵”。^②归侨也因此可以作为一个敏锐的窗口,观察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

三、离散理论与时空社会学:从海外华人进入近代中国

陈珮珊以离散为视角,将传统研究中相对静态与被动的华侨群体,放在勾连中国与世界的动态媒介位置上。在他们回归祖国的时刻中,考察外力对近代中国的冲击与塑造。作为一部华人研究的史学著作,本书之所以让读者耳目一新,主要原因在于作者对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特别是离散研究与时空社会学。

(一) 离散理论与海外华人研究

离散的概念原型和典型案例是犹太人离散,以及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为代表的传统离散。自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离散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1.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犹太为代表的传统离散,扩展到其他受难族群,如非洲人、爱尔兰人、巴勒斯坦人等;2. 20世纪80年代,离散被赋予“隐喻性含义”,包括移民、侨民、难民和少数族裔在内的族群均被纳入离散范畴,传统离散含义式微;3. 20世纪90年代,受后现代思潮影响,身份被建构或解构为去疆域化的(deterritorialization)、灵活的和因时而异的概念。由此,任何在空间上分散的人群皆可视作离散,如跨越边界的语言类别(语系)、全球宗教共同体(教徒)、文化群体(酷儿、保守主义者等);4. 世纪之交,建构主义的离散概念逐渐巩固,但因其变得包罗万象,解释性也被削弱。^③在实体层面的离散中,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提炼出三个核心要素:空间分散、“祖国”取向与边界保持。对真实或想象祖国的向往,是离散群体价值、身份与忠诚的权威来源;同时他们主动或被动拒绝同化,以此保持与当地社会的边界。^④此外,科恩(Robin Cohen)还从时间流逝的角度指出,离散是随时间流逝而出现的暂时性创造。离散并非形成于第一批移民到达侨居地,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因移民记忆、与祖国的情感和联系的变化而变化。^⑤因此离散状态的维持,得益于与过去存在着牢固的或不断复兴的联系,在当下同化受阻及未来仍允许离散意识的出现。离散所具有的鲜明特征中,很重要的一点即是经常回归祖国以获得集体认同,即使有些是通过间接或断续的方式。^⑥

正是基于离散的原型及传统含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赓武在多个演讲、访谈及文章中,

① Shelly Chan, *Diaspora's Homeland: Modern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 Migration*, p. 160.

② Shelly Chan, *Diaspora's Homeland: Modern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 Migration*, p. 183.

③ Robin Cohen, et al.,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2008, pp. 1-2; Rogers Brubaker, "The 'Diaspora' Diaspor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8, No. 1, 2005, pp. 1-4.

④ Rogers Brubaker, "The 'Diaspora' Diaspora", pp. 5-7.

⑤ Donna R. Gabaccia, "Time and Temporality in Migration Studies", in Caroline B. Brettell and James F. Hollifield, eds.,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Routledge, 2015, p. 50.

⑥ Robin Cohen, et al.,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pp. 16-17.

明确反对使用离散华人(Chinese diaspora)概念。其主要担心离散所具有的凝聚性、同质性和排他性内涵,会使人联想起“华侨”一词,容易造成世界各地华人都是一个单一的散居者、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虚构感知。这不仅不符合当代海外华人的现实,亦容易被媒体和政治家脱离情境地滥用,从而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反华、排华后果。^①徐元音(Madeline Hsu)认为离散及离散时刻刺激了王赓武和史书美(Shih Shu-mei)所警示的那种华人“本质主义倾向”,其方法论的不明确性,也使得王赓武提出的华人“定居却不同化”与离散形态及中国取向联系在一起。因此,为了将海外华人从与中国、华人性的联系中解脱出来,徐元音特别推崇史书美从比较文学角度提出的“华语语系”(Sinophone)概念,强调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华人/华语实践的多样性、差异性和混杂性,提倡在当地的语言、文化与社会背景中讨论华人。^②除了担心将离散应用于海外华人所产生的中国中心倾向,有学者认为华人移民也并不符合离散的标准。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指出,离散通常以更类似于流亡的分离为前提,回归是基本禁止的或者推迟到遥远的未来。^③而从出洋时就想着有朝一日落叶归根的华人,并不符合离散概念内涵。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孔飞力在《他者中的华人》中并未使用“离散”,因为“大多数人与其说是确定性地‘离开中国’,还不如说他们正在扩展劳作者和家庭之纽带的空间维度”。^④

20世纪90年代跨国主义、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去疆域化等新概念出现,促进对移民及身份的思考超越国家和文化边界,离散的讨论也开始去实体化(de-substantialize)。麦基翁(Adam McKeown)提出将离散作为视角研究华人更有价值。作为视角的离散(diasporic perspective)将关注点从有界群体转向地理分散的联系、制度和话语,将地方变迁嵌入更大的全球进程之中。离散身份并非界定一个群体的特性,而与特定时间、特定社会视角紧密相关,如全球贸易网络、国际体系、国内观点和社会阶级等。19、20世纪之交民族主义的国际化及国内对华侨认识的转变,使得离散作为一种自觉的身份与中国的民族国家一同发展,而非其对立面。^⑤布鲁贝克认为作为视角的离散,仍被视为归属感本质化的一种选择或其非地域性的一种形式,即共同体和身份的形而上学仍然存在。他将离散进一步解构为一种实践——它被用来提出主张、阐明规划、表达期待、动员力量、呼吁忠诚、寻求重塑而非仅仅描述世界。^⑥

陈珮珊正是在非实体层面上,从时间维度继续拓展离散的讨论——以时间之尺衡量,华侨不仅是一系列的跨国社群,也是一连串的跨国时刻。在离散过程中,华人与祖国是相互交错、互相构成的,身份与文化都在不断重构中。因此,重要的并不是将中国去中心,而是探索中国身份与文化因时而异的可能性。海外华人与祖国每一次相遇的时刻,都彰显了土生与新客、传统与现代、不连续的与连续的不稳定关系。离散远非进化的一个阶段,它可以不断地被激活,因此是未完成的。^⑦

从以上梳理可看出,学界对离散的讨论已经突破原初的族群层面,越来越强调对分散世界各地

① 王赓武《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发展》,《华人与中国:王赓武自选集》,第315—316页;Gregor Benton and Hong Liu, *Diasporic Chinese Ventures: The Life and Work of Wang Gungwu*, Routledge, 2004, pp. 49-60, 157-177.

② Madeline Hsu, “Decoupling Peripheries from the Center: The Dangers of Diaspora in Chinese Migration Studies”,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Vol. 20, No. 2, 2019, pp. 208-210.

③ James Clifford,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9, No. 3, 1994, p. 304; Adam McKeown, “Conceptualizing Chinese Diasporas, 1842 to 1949”,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8, No. 2, 1999, p. 322.

④ 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前言”第5页。

⑤ Adam McKeown, “Conceptualizing Chinese Diasporas, 1842 to 1949”, pp. 306-337.

⑥ Rogers Brubaker, “The ‘Diaspora’ Diaspora”, pp. 10-13.

⑦ Shelly Chan, “The Case for Diaspora: A Temporal Approach to the Chinese Experienc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4, No. 1, 2015, pp. 107-128.

的空间状况的解读,关注全球化时代流动与固守、移民与回归、身份与适应、现代与传统、策略与认同、连续或不连续的对话。离散不仅是族群或情感归属,而是一种状态。因此,为了摆脱与华侨政治性内涵的关联,而封闭离散讨论华人移民的边界,不仅落后于学术潮流,而且可能悖论性地凸显了历史上华侨的政治性,与全球化时代华人移民的差异越来越大。事实上,将海外华人纳入离散群体的比较研究,参与离散非实体层面的拓展讨论,将极大丰富华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在这方面,离散华人与社会学理论的结合,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

(二) 时空社会学与离散华人研究

时空社会学研究社会的空间结构和实践变化,其建构的社会时空观,核心在于时间和空间是社会生产出来的,时空尺度是可变和多样的。^①涂尔干认为时间是一种由社会所建立的制度,用以促进机体行动的发生,并构筑出有相应韵律的社会集体生活。^②“时间生态学”则意味着不被现代社会标准时间所束缚而出现的不同“时景”(timescape)。^③“离散时间”作为一种制度时间、社会时间,它规划离散族群生活,体现移民经历对个人、家庭乃至地方的影响。侨乡也由此成为“离散时间”具体化的“时景”——不同时期海外影响的凝固表达,其生计方式、流通货币、建筑风格、风俗习惯等,都嵌入了东南亚或北美、澳洲的元素。“离散时刻”则代表一种互动契机,反映海外华人与中国的互动、中国史与全球史的纠缠。

列斐伏尔提出“社会空间”概念——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实践造就了社会空间,社会空间反过来又成为社会实践的条件。^④离散空间正是离散群体在祖籍地与定居地之间搭建的社会场域,其维持的多样化跨境联系,将两个或多个社会同时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功能性空间的离散,充满着相互竞争的文化边界、弹性公民身份和密集的人员、资本、商品、技术和信息的流动。因此,在民族国家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世界,“离散是(凸显)跨国时刻的典范社群”。^⑤19世纪末,离散华人空间的形成与拓展,受到中国和东南亚现代化的强力推动。帝国主义进入该区域后,迅速在沿海口岸建立了紧密的交通往来,航运、电报、电话、国际新闻机构等,便利了海外华人靠近、了解和接触中国。^⑥离散空间包含祖乡、口岸及侨居地等多个核心地,其空间的互动也发生在一系列连通的个人和地方网络之中。这些网络是跨国的机制、组织和个人联系,它使得离散成为可行的经济策略和稳定的系统,以实现商品、人员、信息和利润的流通。^⑦在《他者中的华人》中,孔飞力以“通道—小生境”理论概括了这一空间结构的稳定与形式的多样。^⑧陈珮珊则进一步以案例阐释,“通道”中思想、文化的流通及对祖国一端“小生境”的影响,是观念性与社会性空间的展现。如此,作者参与近代中国转型研究,并在关注新式外交官和留学生的媒介作用之外,增加一个离散华人的维度。

① 景天魁、张志敏等《时空社会学:拓展和创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1页。

② 郑作彘《时间形式的时候化:社会时间形式的改变及其当代现状》,《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期。

③ 郑作彘《社会的时间:形成、变迁与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④ 景天魁等《时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162页。

⑤ Laurence J. C. Ma, "Space, Place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Laurence J. C. Ma and Carolyn Cartier, eds., *The Chinese Diaspora: Space, Place, Mobility, and Identity*,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pp. 1-49; Khachig Tölölyan, "The Nation State and Its Others: In Lieu of a Prefac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Vol. 1, No. 1, 1991, pp. 3-7.

⑥ 王庚武《政治意义上的华人——他们对缔造东南亚现代史的贡献》,《中国与海外华人》,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60页。

⑦ Adam McKeown, "Conceptualizing Chinese Diasporas, 1842 to 1949", pp. 317-322.

⑧ 关于“通道—小生境”模式的概念内容,可参考李明欢撰写的“译后记”。参见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第445—447页。

四、华人研究的史学基础: 案例选择的不足与启发

诚然 陈珮珊结合离散理论与时空社会学 拓展了华人研究的视野。但就华人研究的史学基础来看, 本书的案例选择存在两方面不足: 一是作者对中国(文)学界的研究不够重视, 忽视与部分同题研究的对话; 二是“离散时刻”案例选择的标准不甚清晰, 导致其论证“离散华人如何改变近代中国”不够充分。

首先, 作者在开篇即提出传统华侨史对“移民如何影响近代中国”关注不够, 这一判断显然不符合国内研究状况。可以说, 研究华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影响, 正是国内华侨史的起点和重点。如华侨支援辛亥革命与抗日战争、侨资促进中国现代化、侨汇对侨乡文化和慈善事业的贡献等。^① 此外书中所涉及的华工问题、侨乡土地改革与婚姻法、归侨的社会主义改造等议题, 与袁丁、沈惠芬和王苍柏教授的研究有相当的对话空间, 但作者关注不够。^② 其次, 作者提出的“离散时刻”概念似乎包罗万象, 究竟哪些片段可被纳入其中? 是否史料获取限制了案例选择? 不可否认, 作者挖掘了以往华侨史中未被充分留意的片段, 如暨南学人与林文庆的案例, 但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

在作者研究所覆盖的 100 多年间, 我们看到的离散片段不仅限于此。19 世纪 70 年代留美幼童及“一战”期间赴欧华工, 都可被视为离散华人。他们的离散时刻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已为学界所关注和论证。^③ 延续而下, 在本书所缺失的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时期, 处于离散华人范围内的, 不仅有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艰难度日的“番客婢”, 还有流散星洲苏岛的“南洋文化人”。^④ 或因史料散漫, 或因题材敏感, 学界对这一华报编辑群和华校教师群关注不足。从本书提示的离散视角出发, 可帮助我们重新思考, 他们在 20 世纪上半叶南洋旅居的经历, 以及其后参与中国侨务及东南亚的外交工作。进一步拓展我们的视野, “离散时刻”的透镜也让我们关注到中国近现代史上更广泛的回归移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除陈珮珊讨论的华侨妇女、资本家与农场归(难)侨之外, 还有 6.4 万余名归侨学生(侨生)值得关注。^⑤ 侨生北归大陆构成的“离散时刻”, 既可诠释党和国家因时而变的华侨政策, 展示冷战背景下普通侨民的生存状态, 又可串联起从民国延续至今的侨生回国升学历程。

本书以离散为视角, 诠释离散的中国经验, 并将中国史放入全球史视野下考察。作为方法的离散, 启发我们破除中心及国家观念, 用交错与依存的网络化眼光看待中国历史。突破物理意义上的各种边界, 将全球拉力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常量。如此, 离散者所勾连起的碎片化空间与时间, 也可

① 相关研究可参见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袁丁等《民国政府对侨汇的管制》,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任贵祥、李盈慧《华侨与国家建设》, 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第 14 卷,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② 袁丁:《晚清侨务与中外交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Shen Huifen, *China's Left-behind Wives: Families of Migrants from Fujian to Southeast Asia, 1930s-1950s*, NUS Press, 2012, pp. 161-188; Wang Cangbai, "Guiqiao as Political Subjects in the Mak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in Xiang Biao, Brenda S. A. Yeoh and Mika Toyota, eds., *Return: Nationalizing Transnational Mobility in Asi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63-82.

③ 参见徐国琦《一战中的华工》, 潘星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徐国琦《中国人与美国人: 一部共有的历史》, 尤卫群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175-238 页。

④ 就目前所搜集材料, “南洋文化人”可能在 1945 年由沈兹九最先使用。参见沈兹九《战争中的南洋文化人》, 《文萃》1945 年第 15 期。

⑤ 《中侨委二司张帆司长报告》, 1964 年 4 月 20 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 资料号: 4011-002-0051。陈珮珊虽有专文涉及侨生群体, 但在材料、时段及分析方面仍有很大推进空间。参见 Shelly Chan, "The Disobedient Diaspora: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Mao's China, 1958-66",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Vol. 10, No. 2, 2014, pp. 220-238.

显示民族国家建立、发展与复兴的轨迹。以离散华人为主体的叙事,其自下而上的眼光也论证了“移民与祖国的关系并不一定是边缘—中心的互动,而是在同一舞台上出现、消失与复现的共舞”。^①本书的另一贡献在于对历史研究中时间维度的关注。作者用“离散”概述在世界舞台上成为“华人”的各种变动不居的情形,而“离散时刻”所彰显的华人性既是去中心的,也取决于和祖国相遇的时机。通过勾勒华人离散的五个时刻,作者提出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新洞见——国家更像是一个在不同时刻将全球因素和地方因素纳入的“拼盘”,它不仅是多空间的、复节奏的,也总是不完全的。^②

按布罗代尔对时间的划分,这些“离散时刻”只是“深层海浪在表层掀起的浪花与尘埃而已”。^③但作者想要展示的是,通过时刻所掀起的“浪花”,思考近代中国与全球的勾连、海外华人对近代中国的塑造,探究全球时代近代中国转型这一“深层的海浪”。因此,这些“浪花”也启发了我们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南洋文化人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归侨学生的研究。

需要承认的是,陈珮珊所提出的离散理论应用于华人仍存在争议,离散时刻的界定也存在模糊不清的情况。其以离散华人为主体的研究,落脚点仍在于移民对民族国家的影响,这与20世纪90年代移民研究中兴起的跨国主义,以及世纪之交“跨国华人”研究存在明显区别。^④从学科角度看,虽然国内学者从21世纪初就发出建设“中国华侨华人学”的号召,但至今它仍未成型。^⑤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或方向,华侨华人研究从诞生伊始就是跨学科的,因此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移民研究、离散研究、跨国主义等方法与理论的借鉴。就此而言,陈珮珊将历史学案例与社会学理论思考相结合,向我们展示一个较为成功的跨学科华人研究的范例。贯穿其中的性别视角、阶级话语及精彩的文本分析,则对狭义的华人研究和广义的中外关系史、中国近代史研究都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作者陈非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1)

(责任编辑:敖凯)

(责任校对:尹媛萍)

① Shelly Chan, *Diaspora's Homeland: Modern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 Migration*, p. 185.

② Shelly Chan, *Diaspora's Homeland: Modern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 Migration*, pp. 193 - 194.

③ 孙晶《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及其评价》,《广西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④ 对移民研究中的跨国主义和跨国华人的研究综述,可参见潮龙起《移民史研究中的跨国主义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跨国华人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对海外跨国主义华人研究的评述》(《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

⑤ 李安山主编《中国华侨华人学:学科定位与研究展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吴小安新作从概念、主题、范式等方面评述国际学界对离散华人的研究。作者赞同“离散华人”概念,并通过比较华工研究、华侨研究、华人研究及文化中国研究等,提示北美、东南亚本土及中国学者研究的不同,指出离散华人研究仍存在由英文学界和华人移民学者主导,他们从域外的、华人社会视角出发,而中国本土学者在相关议题的讨论中失声的情况。参见 Xiao An Wu, “Shifting Paradigms of Chinese Diaspora Studies and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Transnational Chinese Communities: A Holistic Review”, *Translocal Chinese: East Asian Perspective*, Vol. 14, 2020, pp. 9 - 36.